

奥地利学派与中国

中国转型的 理论分析

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罗卫东 姚中秋 主编

余赴礼

从奥地利主观方法论「经济转型」

冯兴元

中国的「奇迹」：成因、问题与展望

高全喜

30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

奥地利学派与中国

中国转型的 理论分析

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罗卫东 姚中秋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 罗卫东，
姚中秋主编.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6
(奥地利学派与中国)

ISBN 978 - 7 - 308 - 06836 - 9

I. 中… II. ①罗…②姚… III. 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9800 号

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视角 罗卫东，姚中秋 主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楼伟珊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6836 - 9
定 价 42.00 元

前 言

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变迁已经进行了30年。社会各界都在进行纪念、反思，华人哈耶克学会也将2008年的学术年会主题确定为“中国30年改革的理论分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参加年会的学者所提交的、从奥地利学派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相关论文的汇编。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斯的理论意图是“古典的”，即试图发展一门解释以物质财富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如一位学者所说：“门格斯对人类文明进步之道的论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经济发展理论，而非静态的经济配置理论。”^[1]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门格斯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行动及其借以行动的知识。也因为如此，他对制度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中，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理论。通过对制度生成机制的解释，他也同时解释了经济是如何增长的，以及文明是如何生长与扩展的。

不过，差不多是从路德维希·米塞斯开始，奥地利学派的关注点

[1] Karen I. Vaughn, 1994, *Austrian Economics in America: The Migration of a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4. (中文版：卡伦·沃恩，《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朱全红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

2 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

过分地转向方法论。当然，米塞斯本人极大地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比如他的信用、货币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1912），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后来依据这一理论对美国大萧条进行了分析^[1]。米塞斯也在社会主义大论战中，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比较制度理论（主要著作是1922年的*Die Gemeinwirtschaft: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Sozialismus*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比他稍晚的哈耶克也发展了商业周期理论（*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与资本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

不过，也许是因为身处在自己的学术传统被不断边缘化的学术与社会环境中，米塞斯、哈耶克对于方法论问题也极端关注（比如米塞斯著有*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ökonomie*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1933）。他们关于应用经济学的讨论，通常也刻意地突出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特殊性。这种学术关注点后来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圈内似乎形成了某种“方法论”狂热。与此相关，这个圈子的学者们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相关研究也是经济学传统中最具有哲学意味的。但是因此而忽略应用经济学的讨论，忽略对现实的解释，却只能使自己的理论更为边缘化。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奥地利学派的复兴，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开始淡化方法论意识，转而关注经济学的实体问题。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接续米塞斯、哈耶克的资本、商业周期理论，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宏观经济学，这方面重要的著作有Roger Garrison的*Time and Money*（2000）和Steve Horwitz的*Microfoundations and Macroeconomics*（2000）。

还有很多学者致力于发展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理论。学者不断地

[1] 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谢华育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核算大论战”，并依据奥地利学派的比较制度理论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轨现实，讨论苏联制度的形成过程与转轨前景。Peter Boettke 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包括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viet Socialism: The Formative Years, 1918 – 1928* (1990); *Why Perestroika Failed: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1993); *Calculation and Coordination: Essays on Socialism and Transi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1)。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提出奥地利学派的增长与发展理论，用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比如，目前在台湾地区任教、为本书也贡献了一篇文章的余赴礼教授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97);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Systems and Government* (2007)。

所有这些应用经济学理论，都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过程。

毫无疑问，奥地利学派理论在中国晚近发生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米塞斯、哈耶克的著作被大量译介入中国。引人注目的是，国内译者更为偏好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甚至是政治学论述，迄今为止，除了 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过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译本——当然现在早已绝版——之外，90 年代以来，没有人翻译哈耶克早年的专业经济学著作。因而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对中国学界、公众的影响似乎主要发生在观念层面。^[1] 米塞斯、哈耶克关于市场优越于计划、计划经济不可

[1] 有学者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美国学术界对奥地利学派兴趣复苏的一个原因就是“奥地利学派主要阐述者背后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 (Peter J. Boettke and David L. Prychitko, 1994, “The Future of Austrian Economics”, in Peter J. Boettke and David L. Prychitko (eds.),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in Contemporary Austria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p.290)。

行的论述，对于人们确立市场信念产生了重要作用，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制度变革，不仅在经济领域，也包括法律、社会与政治领域。哈耶克关于法治的论述，对于主流法学理论的形成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学界，始终存在着一个奥地利学派，渗透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当然，奥地利学派如果仅仅具有观念、信念功能，那它的生命力就不是持久的。其实除了对市场、法治、宪政的信念之外，奥地利学派也对这些价值提供了可信的学理论证，同时也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设计框架，至少在其相关的讨论中隐含了这些内容。对于中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来说，发掘、阐述和发展这些理论，既可推动奥地利学派自身理论的发展，也有助于理解中国所发生的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制度变迁。过去30年中，中国经历了新一轮制度剧烈变迁过程。在此过程当中，中国经济也经历了长期而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经历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变迁，具有丰富理论资源，尤其是关于人、行动、规则、制度之理论资源的奥地利学派，完全有能力提供有效的解释。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对于解释这样的变化，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借助丰富的制度比较研究，奥地利学派对于市场、法治、自治、宪政等制度的机理理当有更为深入的理解，这种理解有助于解释已经发生的变化，描述变化的现状，以及预测变化的前景。

本书就是中国的奥地利学派学者——不论其认同程度之强弱——在这方面进行的一次努力。这里所收录的论文涵盖了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领域。全部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的论文利用奥地利学派理论及相关理论对中国过去30年所发生的制度变迁进行了一般性讨论；第二部分的论文集中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变迁；第三部分的论文关注的是法律、社会制度的变迁。

这样的努力只是一个开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理论是一座富矿，值得更多人进一步挖掘。奥地利学派学者所发展的信用货币理论、制度理论、企业家理论、知识理论、普通法理论、商人法理论、宪政理论等，对于中国学者理解中国转型的问题及设计转型的制度方案，均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

这一次华人哈耶克学会学术年会的召开，得到了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姚中秋

2008 年冬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部分 制度转型的一般理论

- 从奥地利主观方法论“经济转型” 余赴礼 / 3
- 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 姚中秋 / 22
- 从“一国两制”到“一制两体”
——中国改革动力学的香港视角 魏甫华 / 74

第二部分 经济制度变迁

- 中国的“奇迹”：成因、问题与展望 冯兴元 / 93
-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
——企业家视角的解读 朱海就 / 127
- 资源要素租金与国有企业改革
——兼论重建“全民所有制” 张曙光 / 142
-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 刘宪法 / 161

第三部分 法律与社会制度变迁

- 30 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 高全喜 / 195
- 政府改革的理论研究：回顾、评价与展望
毛寿龙 李文钊 / 244
- 税权法定：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词 韦森 / 272
- 中国的改革历程与宪政出路
——关于中国宪政前景的一个大胆猜想 莫志宏 / 294
- “中国 30 年改革的理论分析研讨会”综述 / 324

第一部分 制度转型的 一般理论

从奥地利主观方法论 “经济转型”

余赴礼*

提 要：虽然近年关于经济转型的文献大量涌现，但是我们对于经济转型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有限。本文提供一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转型”理论。这个理论以人为本，方法上建基于“人类施为”的概念，且着眼于人的主观思维、学习、期望、错误、尝试及创见等元素。本文运用及发挥主观方法去阐明经济转型现象，结论是各转型经济会朝向个别特有的体制发展，而这种发展是无人能预知的。本文的理论架构能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阻力和抗拒，并对两类改革，即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经济转型；体制；人类施为；主观明白；知识与学习

一、前言

自俄罗斯、东欧等国放弃极端中央计划经济，学者们便对经济转型产生浓厚兴趣。不幸的是，自柏林墙倒下后近 20 年间，我们对转型经济理解仍是十分贫乏 (Roland, 2001)。关于转型期经济的问题，在观点上仍存极大的分歧。虽然近年关于转型体制的文献不

* 台湾逢甲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4 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

断大量涌现，但是我们对于转型期经济的概念还是相当混乱^[1]，欠缺一个可以在转型过程中作为政策指导的理论（Havrylyshyn, 2001）。Kornai（2000）更坦言我们不需要为经济转型作出定义，我们只需知道开始与结束便可。缺乏了理论，难怪政策指导会出现混乱。

主流新古典学派学者认为经济转型存在严重的经济扭曲^[2]，所以他们主张纠正价格。新古典学者忽视了结构性不明确、学习及演变过程，且把均衡等同于经济稳定，如此一来，过渡期的不稳定就是发生在两均衡点之间。例如，Roland 和 Verdier（2000）就转型期政策执行上产生的协调问题建议排除坏的均衡处。大抵而言，主流经济学者的政策建议皆围绕着如何由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到民主式的市场经济。这些学者不理睬历史及制度的局限，相信“只要砍掉中央计划经济，开放市场，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便可水到渠成”（Hare, 2001）。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国际上执政策建议牛耳，特别是“华盛顿协议”^[3]的学者与策划者，他们着眼于资源配置效率。他们对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工程，抱极大信心（Roland, 2001）。“华盛顿协议”人士全面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分析与思考过程完全脱离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政治及社会状况（Weisskopf, 1997）。“华盛顿协议”之观点建基于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和稳定经济政策，未能掌握每个国家的特有历史因素，结果不能解释转型体制所发生的现象。很自然地，当这些人士发现俄罗斯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价格开放后 GDP 大幅度下挫，便大感震惊且不

-
- [1] 文献中关于转型经济的定义，仍不清晰。传统经济理论大抵认为转型经济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渡体制（IMF, 2001）。IMF（2001）曾制定了转型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程度的总指标。在奥地利学派的文献中，Colombatto（2002）以时间去定义转型经济：一个经济转型需要多久时间引入、建立和固定新体制和新组织；人们需要多少时间学习运作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新体制以及适应他们从未遇到过的游戏规则。
- [2] 例如 Kierzkowski（1997）提出经济转型是从生产可能曲线内缺乏效率的位置转移到比较接近生产可能曲线的更有效率的位置。Havrylyshyn（2001）也用相似的新古典观点。
- [3] John William 于 1990 年首次用“华盛顿协议”一词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人士的意见（Roland, 2001）。

知所措。

本文将提出一个奥地利学派的转型体制理论。至今利用主观方法研究转型体制者不多，例外者如 Colombatto (2002) 尝试利用奥地利学派方法分析转型经济。他特别应用了哈耶克之说，提出三个准则来看经济转型：一、知识之获得；二、个人责任；三、市场自由进出。依 Colombatto 之见，分析转型经济，应留意机会之改变及人民是否愿意掌握这些机会，故此外来之冲击应当被视为机会之来临。Colombatto 正确地指出知识问题对于了解体制改变极为重要。可惜他只强调机会与局限，使得他的论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似，而未能够把奥地利学派的主观精神发挥。本文将把经济转型定义为社会知识库正在急速转变的经济。本文之独特处在于以人为本，并将从人之主观元素，如感知、学习、错误、期望、尝试及创新等去了解体制之转变。

本文从认知角度看经济转型，方法上建基于“人类施为”(human agency) 的概念及从人的思维出发。如此，人类建立的制度可被视作社会的知识库，这些制度是人类经过不断运用资源的过程而不自觉地衍生出来的结果。经济转型的意义也就是制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是来自人的主观思维的改变。制度的稳定就是人民集体认为其共同的知识库已达到协调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不思改变。换言之，他们对外来事物的诠释是相近的，且不会有矛盾。本文之奥地利学派架构可以帮助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转型期间对新事物抗拒的原因；第二，厘清两种改革方案，即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

二、哈耶克的认知过程：心智、感知与归类

或许哈耶克是第一位有系统地对人如何处理不确定问题而提出认知模型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如下文所述，他建立了一个“心智建构”模型，以了解制度之出现。根据哈耶克的讲法 (Hayek, 1952, 1962)，明白他人的行动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当中涉及界定类型、模

仿、内化（接受）并转换成跨越空间与时间范畴的行动或知觉。人在模仿及行动之前，必须了解和界定他所看过的外来事件。然而不是所有的外来现象都是全新的，它们可能与某些过去经验过的东西相似（Hayek, 1952; Fleetwood, 1995: 111）。哈耶克（Hayek, 1952: 104）将此感官上的知觉描述成“分类的执行”，换句话说，人的心智有能力按感官对外来事物分门别类。纵使这人对某些现象从未经验过，也能粗略地把它认知为“同一类型”。在感知的过程中，人在心里逐渐建立了一套过往外来事物冲击的记录，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套外来冲击物之间的联结性或相关性的记录，并用来比较眼前的新事物。以哈耶克之言（Hayek, 1952: 142）：

我们所知觉的永远不会是个别事物的独特性质，而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共同的性质。因此，感知永远是一种诠释，一种将某事物置于某一类或某几类的归类活动。

如果某事件或一连串的外来刺激物多次重复出现，就会在脑海中注记下来而形成类型。当每一次出现同样的事情或冲击，脑中就会产生相同的反应。这就是说，该外来事件所产生的“刺激信号”会行走相同的路径，形成相同的联结，并产生相同的结果，最后是该事件会被归为同一类（Fleetwood, 1995: 115）。值得再提的是，感知建基于个人的经验，所有感受到的东西会遇到已经记录在脑海中的资料库。每一次接收一个或一种新的外来信息（即刺激元素），都会受到先前归类的影响。每一个新的现象之被感受，都会与其他事件关联起来，并与其他同类的事件相提并论（Hayek, 1952: 142—143）。^[1]

[1] Lane 等（1996: 53）从哈耶克的观点论述道，当所遭遇的新处境要求有所行动时，我们的心智系统“根据先前经验过的处境而形成的模式，开始对该处境进行归类的动作。不同的类别分别联系特定的行动：此联系决定于与当前处境特征相似的过往所采取之行动的效果。根据该联系，此归类—行动体系因而产生了一个行动”。

三、经验法则与制度作为协调的机制

上节揭示了人的感知与行动是由经验所操控。哈耶克认为，因为人类思维能力有限，为了节省脑力，所以要依循经验法则办事。运用经验法则是人们应付其知识贫乏的方法（Hayek, 1967: 90）。用经验法则来带领行动的现象是因为多数时候，面对特定环境时人们无可避免地受到知识不足的困扰，而特定环境却又决定行动。经验法则可以帮助我们复杂处境之下进行决策，方法是减少在复杂环境下所需考虑的因素，缩窄了我们选择的范围，只需单独地抽出事实的类别，便可决定应采取的行动（Hayek, 1964: 11）。以哈耶克之言（Hayek, 1962: 56—57）：

……经验法则常常决定或限制了可能的选择范围。借着删除某类选择，并提供某种常用的达成目标的方法，经验法则限制了我们进行有意识选择的范围。

例如，当道德规则变成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时，某些选项根本不会出现在他的选单中……因为道德规则引导行动，所以我们观察某人不会做什么比看他会做什么更佳。

因此，“经验法则不仅控制我们的行动，也控制我们的感知，尤其是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感知”（Hayek, 1962: 45）。制度或办事准则可以被视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它们简化这个世界的复杂度，让事情的运作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也标准化了这个复杂世界，并协助解决市场互动的问题。每个人在有规范的世界中行动，确保了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的规律性及社会秩序。因此，制度的改变可视为新的办事准则尝试取代旧的办事准则的过程。